

崔田夫：陕北党内的“老掌柜”

王树贵

崔田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在党内被亲切地称为陕北的“老掌柜”。时至今日，崔田夫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但他积极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与人民群众一起组织生产、尽心尽力为人民排忧解难的身影，却依然历历在目……

2022年11月21日，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崔田夫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崔田夫，原名崔文亮，又称“二老崔”，1902年出生于绥德县崔家湾镇铁茄坪村。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革命活动，任铁茄坪支部书记、南区委副书记、绥清县委书记。1933年被选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书记。1935年2月，在陕北陕甘边特委周家硷联席会议上，当选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代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绥德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署副主任、党组代书记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北行署副主任、代理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山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无定河治理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视察室视察专员、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78年病逝于西安。

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928年，铁茄坪村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崔田夫，这是直属中共绥德县委的一个村级党支部，也是陕北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在支部成员崔田夫、崔耀光、崔田夫的带动下，以铁茄坪村为中心的绥德南区，燃起了革命烽火。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陕北革命形势一落千丈，一些在大革命高潮中异常活跃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或销声匿迹，或远走他乡，党、团各级组织多数瘫痪，革命活动陷入了低谷。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崔田夫担任了中共绥德铁茄坪村党的支部书记，他积极联络党、团员，召集会议，进行革命形势宣传和教育，在挫折面前，坚定理想信念，守住了革命阵地，铁茄坪支部成为陕北大革命失败后少有的健全的党组织。

1928年、1929年，陕北历史上罕见的大饥饉年，绥德党、团发起并领导了城内“抬龙王”和“打蛋厂”农民运动，铁茄坪支部成为南区最先响应运动的农村党组织。支部书记崔田夫带着四乡农民，进城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斗争。

1929年春，绥德南区薛家峁镇老总薛运通，把南区群众为防灾年而积存的“义仓粮”卖给了井岳秀的部队，置万民死活于不顾，中饱私囊。区委

负责人崔田夫领导农民开展要粮斗争，他带领南区几十个村庄的近千名群众，和薛运通斗智斗勇，经过多个回合的缠斗，迫使官府向四乡饥民放粮，斗争一次次取得了胜利。崔田夫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威力，革命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

1933年春夏间，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陕北各地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开辟农村工作、创建红色苏区的战斗任务，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在陕北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崔田夫参与陕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在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书记。

在腥风血雨中，崔田夫打起锄头，以打短工为名，到处寻找党内同志。他找到了搞武装的高朗亭，组建了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派崔正甫在绥德南区的王家沟村，筹建了红五支队。他设法找到了绥德、清涧党的负责人，指定由张家修、崔文运、张绍修3人主持中共绥清中心区委工作。他到佳县南区主持召开特委会议，重新部署了整建党、团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整顿和重建工作，开辟了绥、清红色区域。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下，整顿了因战斗失败而人散枪埋的红一支队，交给北方局派回陕北的谢子长，恢复重建了这支武装。崔田夫主持陕北特委工作半年，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安定、绥清、佳吴、神府各地开辟苏区工作如火如荼，陕北革命迈向新的发展时期。

1934年夏，崔田夫的胞兄、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被敌人杀害，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也被抓捕坐牢。敌人设下圈套，逼他就范。在生离死别的考验面前，他部署好党的工作，抛下亲情，以党的事业为重，毅然前往天津向北方局汇报陕北革命斗争情况。经过艰苦努力，至1934年底，成立党团员各7个，红军游击支队22支，成立了红八十四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陕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5年2月，任西北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是陕北、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被同志们称为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

坚守理想信念 牢记执政为民

陕北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突变，不少党、团员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自动脱离组织，信仰动摇，意志消沉。

铁茄坪村党、团组织转入地下后，客观地对时势进行分析和预判，加强对党、团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党、团员在革命低潮中认清了形势，坚定了对敌斗争信念。农民出身的支部书记崔田夫，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党组织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炽热情怀。他认定一个理：共产党是穷苦劳动人民的党，他跟上共产党闹革命就要干到底，决不会三心二意，不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正是在这种思想之下，铁茄坪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谷中，党、团组织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得到发展和壮大，保全了党、团组织，保存了党的力量，成为绥德南区的一个红色堡垒。1933年6月，崔田夫参加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鉴于绥德南区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他的工农身份，崔田夫当选为特委书记，在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创建陕北苏区的重任。尤其是国民党在米脂制造了“无定河惨案”后，崔田夫不顾自身安危，以揽工为掩护，奔走于陕北南部各县的广大农村，联系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传达特委指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创建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为目标的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在危险面前冲在最前面，凭的是对党的一片赤诚，凭的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在白色恐怖面前，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和退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勇敢地投入到了党组织的重建和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中。即使在亲人被抓、身处险境的危险时刻，依然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革命事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在像他这样一批信仰坚定、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的坚守下，陕北革命终于渡过了难关，走出了低谷，绥清、绥吴苏区不断扩大并得到巩固，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存在，为历尽艰难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之地。

革命战争年代，崔田夫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安排。在和平环境里，仍然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待遇多少，只要有工作干就行，只要能为人民做事就好，更不会计较个人的升迁、荣辱。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年月，他曾较长时间搞过党政检查工作。和平时期，又长期在纪律检查岗位上任职。对那些违反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素来深恶痛绝。1963年，一次回到家乡铁茄坪，看到满川的枣树被砍得光

光的，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垛满了被砍倒的一堆堆的枣树枝，这让他十分恼火：这枣树是陕北群众祖辈辈栽种的树种，对群众的生活大有帮助。他年轻时这枣子一红了，他就不怕饿肚子了。如今是什么人出的这损招主意，断了群众的充饥物。经再三追查，源头是绥德县委在袁家砭召开全县现场会，县委的一位副书记作了《关于在袁家砭川水地里打枣树 腾出农耕地的经验介绍》的讲话，导致几乎砍光了全县川地里的枣树。崔田夫急了，就打电话给榆林地委，要地委来人处理这件事。地委副书记王怀仁来到绥德，严肃批评了打枣树的错误做法，并要这位副书记当面承认错误，这件事才得以了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崔田夫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乡亲们的生活，关注着家乡的变化。1964年春荒之际，他到绥德南区他当年“闹红”的故地搞调查。考察了崔家湾、苏家岩、定仙塬、枣林坪、田家岔、义合等公社后发现，社员生活的困难程度远超过他的想象。经过实地走访调查，认为找到了症结，写成《关于解决农村特困户生活问题的报告》，分别上报了县、地、省的有关部门，就解决农村中特别贫困群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绥德县民政局很快落实了相关措施，解了特困群众的燃眉之急。1966年的春天，崔田夫来到全国水土保持样板之一的绥德县韭园沟下乡蹲点。他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丝毫特殊照顾，不论在谁家吃饭，一定要放下饭碗和粮票。他到吴家畔视察，发现该队的水土保持工作具有典型性。于是，他把大队队干们请到队窑，他自己掏钱，准备了一顿杂酱饸饹。吃完饭后，他开始向队干们详细了解吴家畔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经过整理和加工，以他的名义向省上写了一份典型报告材料《关于广泛开展学习吴家畔水保经验的报告》，要省上在全省宣传、推广该大队的经验，让更多的社队和群众受益。他在调查研究中，认为各级政府应更加重视农业农村工作，省、地、县应连续不断向农村下派干部，抓典型、树标兵，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为此，他又向省上写了第二份报告《关于干部下乡蹲点的报告》，提出了各级干部抓农业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绥德蹲点的一年时间里，经过与广大农民朋友广泛的接触，从改善群众生活、发展集体经济的角度，提出了改

变陕北山区落后面貌的一系列措施，并在防风治沙、造林种草、多种经营方面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

从参加革命那刻起，体恤民情，廉洁自律，是崔田夫的一贯作风。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在自身过硬的前提下，崔田夫向来铁面无私、敢于碰硬，敢于为民作主，仗义执言，从不含糊。因此不论走到哪里，就会有人找他“告状”“诉苦”。对欺压群众、横行乡里的行为，这个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的汉子，决不会坐视不理。1964年秋，崔田夫从西安回到绥德，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人们听说“二老崔”回来了，告状的人就来了一大群。其中的一宗是义合公社两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称王称霸，欺压社员，告他们状的人站了一屋子。在绥德县委的支持下，经过实地调查，发动社员，揭发检举这两名大队书记的劣行。后经组织批准和法定程序，一名被开除党籍，一名被司法机关法办。最后又把义合公社书记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件事虽然发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民公社时期，但他敢于向不法势力硬碰硬的勇气，令人唏嘘！

农民出身的崔田夫，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自己除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外，时常关注着乡亲们的生产和生活。每次下乡蹲点，看到老乡们生活困苦，成了他最苦恼的事。他说当年奋起革命，是为了消灭剥削阶级和反动势力，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如今革命成功了，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群众当家作了主，生活理应改善了，提高了。但国家建设多少年过去了，群众生活还是个老样子，甚至还不如当年，这令他十分因感和不安。

刚直不阿的崔田夫，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他对毛主席诉说他的冤情，但这个愿望在黑白颠倒的世界，比登天还难。就在崔田夫住院不久，周恩来总理听取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书记的胡炜处理陕西两派造反组织问题的汇报时，问到陕北的“老掌柜”和刘大嫂（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的情况。胡炜原本不知

道陕北“老掌柜”是谁，打听到这个“老掌柜”叫崔田夫，而且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便亲自到医院来探望，还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探望了崔田夫后，胡炜向相关部门指示：一是要省人民医院全力救治崔老，二是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尽量给予解决。胡炜的探望，在精神上给了崔田夫极大安慰。很快省人民医院成立了专家组对崔田夫进行治疗，并由普通病房转到了高干病房，生活待遇一下提高了不少，女儿崔桦也从咸阳调回西安工作。神志清醒后的崔田夫，听到女儿调回的消息后并没有高兴，对提高自己在医院的待遇而不安，用生气的断断续续的语调说：“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说完这句话，崔田夫再也不能开口说话。1978年11月17日，崔田夫的心脏停止跳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这就是崔田夫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人民群众的生活，始终是他牵挂的心结，群众还填不饱肚子，他如何能咽下富强粉！

崔田夫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身为国家八级干部，和老伴儿过着异常简朴的生活。革命虽然成功，但国家困难，人民生活困难，他的一日三餐一直习惯了陕北老家的家常便饭。他经常穿着那身普普通通的干部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多少年。他家里的陈设，没有一件是能拿出手的像样家具。一张办公桌，两只普通棕箱，两张木板床，就是不够一眼看的全部家当。唯有那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办公桌，或许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公家人或干部。他的工资，不是资助了烈士的家属，就是帮扶了困难的乡亲。他所到之处，贫困社队办学需要钱，战友家属困难需要钱，乡里乡亲揭不开锅需要钱，当年无私资助革命的群众需要钱，有多少人需要钱啊！两手难挡四面风，尽管他是个月挣一百多块钱的大干部，也招架不住八面漏风的窟窿。

崔田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5年了。这45年，正是国力日新月异、人民生活由贫穷迈向富裕的45年，他毕生的理想和追求，如今早已成为现实。

巍巍青山，铭刻先辈英名；浩浩岁月，沉淀英烈豪情。

重温红色延安故事



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

这次会议对开展党的白区工作有重要意义，这是党的白区工作由“左”的错误向正确路线实行转变的重要标志。会议的报告和文件，不仅对白区党的工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张闻天、刘少奇主持。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刘少奇对会议作结论发言。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这些报告的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论述了白区工作必须实现彻底转变；二、指明了新形势下白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总方针；三、制定了白区工作的正确斗争策略；四、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要加强党的领导工作。

会议还制定了《关于职工运动的经验及转变方式》等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明确规定了当前工人运动的根本原则和领导工人斗争的方式、方法，指出要在三种不同区域（日本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方法。
这次会议对开展党的白区工作有重要意义，这是党的白区工作由“左”的错误向正确路线实行转变的重要标志。会议的报告和文件，不仅对白区党的工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并改组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不久由于

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共白区工作会议所讨论的事情，完全没有来得及执行。
会议闭幕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等地的代表，在谈话中强调了白区工作要深入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提高。后来，他又根据白区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完整地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党的正确路线和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白区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三名巴西人的中国情缘

新华社记者 赵焱 陈威华

中国与巴西远隔重洋，然而民间交往源远流长，华人移民巴西已有200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巴西人也来到中国访问和生活，见证了两国关系发展。而今，越来越多的巴西人关注中国甚至主动宣传中国，在两国之间架起友好的桥梁。

宣传中国的波马尔

刚刚在巴西东南部城市茹伊斯-迪福拉给当地奶制品企业协会介绍中国情况，次日又来到里约热内卢州的大学做关于中国的讲座，紧接着再到北部城市贝伦参加有关中国新机遇的论坛……往来于巴西各州，在院校和企业宣讲中国、在杂志报纸上撰写与中国有关的专栏文章，这就是米尔顿·波马尔的日常生活。

64岁的波马尔一生都与中国结缘。他的祖父佩德罗·波马尔是巴西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56年就访问过中国；父亲弗拉迪米尔·波马尔是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卢拉作为巴西总统首次中国之行的协调人之一。
受父辈影响，波马尔年轻时就希望到中国去看看。1997年，他终于随巴西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走访了广州等地。“让我最难忘的是，看到当地人民的生活变好了，与爷爷和父亲讲述的中国已经不一样。”波马尔说，这让他产生了深度认识中国的想法。

他说：“此后，我走过大大小小40多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领略过新疆、广西的少数民族风情，品尝过重庆的火锅美味，倾听过吴侬软语的苏州评弹……这些经历让我能够不断地汲取力量，并始终保持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探索。”

新冠疫情期间，波马尔在线上与中国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他计划今年10月再去一趟中国，并且在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出版一本介绍中国的图片集。

研究中国的卡瓦略

今年春节刚过，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就到中国参加了商务部举办的国际商务官员研修班。卡瓦略说：“这次我在北京和海南两地感受到中国民众与以往一样的热情与活力，中国又回到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上。”

卡瓦略38岁以前一直在巴西从事法律工作，业余时间出于兴趣在里约一家中文学校学习中文。2013年，卡瓦略被选中参加中国一个奖学金项目，开启了他的另一段人生——在中国，他成为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的一名访问学者，在继续学习中文的同时积极接触中国文化，透过日常生活了解中国。

2016年回到里约后，卡瓦略不遗余力组织开展推动巴中、拉中交往的活动，频繁往来于巴中两地，以自己所供职的南美洲最大智库瓦加斯基金会作为平台，推动拉美地区对中国的研究。在他的努力下，2017年，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设立了巴中研究中心；随后，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也正式揭牌成立。

已是巴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的卡瓦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巴西人了解中国。他担任《今日中国》月刊葡萄牙文版主编，并推动巴西东进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成立合作选题研发中心，共同推出图书品牌“SHU”，以促进在当地翻译出版以中国为主题的读

物。

教授中文的利维娅

利维娅·达席尔瓦出生在里约热内卢州的小城卡希亚斯公爵城。她最初跟母亲一起学习中文。2012年，她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获得了去中国留学的奖学金。

前往遥远的中国学习，对利维娅来说是个挑战。“我的父亲非常鼓励我去中国看看，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我父亲认为我不能仅仅学习语言，还应该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习俗，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她说。

在湖南师范大学一年半的学习，成都和广州数年的学习及工作经历，令利维娅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勤勉刻苦。“以前我觉得自己学习很用功了，到了中国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学无止境，”她说，“我同时发现自己以前对中国的了解还很肤浅，自己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努力之处。”

新冠疫情期间，利维娅的家乡开设了巴西全国第二所葡中双语学校，当地政府找到了利维娅担任中文教师。“我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孩子的老师，但我在中文学会了怎样去应对挑战。”她说，“我感受到学生们学习中文的愿望非常强烈，不少学生都知道中国较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都希望能去中国看看。”

“中文对于巴西人来说很难，但他们的老师——我就是通过学习中文改变命运的人。我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的学生们，现在的努力付出一定是值得的。”利维娅说。